

民國學術的  
知識譜系

器物學與藝術史

朱淵清 主編

中西書局

# 器物學與藝術史

朱淵清 主編

民國學術的  
知識譜系

中西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器物学与艺术史 / 朱渊清主编. — 上海: 中西书局, 2019

ISBN 978-7-5475-1651-5

I. ①器… II. ①朱… III. ①古器物—中国—文集  
IV. ①K875.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55406 号

---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

---

# 器物学与艺术史

朱渊清 主编

---

责任编辑 邓益明

装帧设计 黄骏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邮编 200040)

印 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77 000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651-5 / K·320

定 价 78.00 元

---

---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021-56475919

# 目 录

|  |           |
|--|-----------|
| 关于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 .....  | 朱渊清 / 1   |
| 罗振玉的收藏与出版：“器物”、“器物学”在民国初年的成立<br>.....                        | 王正华 / 1   |
| 新郑李家楼：从盗宝私藏到学术公器 .....                                       | 徐 坚 / 32  |
| 论“美术考古学”一词的由来 .....  | 郑 岩 / 70  |
| 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的逻辑<br>——梁思成、林徽因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 .....            | 李 军 / 93  |
| 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br>——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叙述与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辽宋风<br>格设计再思 ..... | 赖德霖 / 156 |
| 文化观遭遇社会观：梁刘史学分歧与二十世纪中期中国两种<br>建筑观的冲突 .....                   | 赖德霖 / 204 |
| 沈从文的图像转向：一项艺术史角度的视觉文化研究 .....                                | 李 军 / 229 |

# 关于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

朱渊清

2012年,我和朋友们编了《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2017年4月,我曾为这套书写了一个长序。现在这套书终于要出了,我想简单地说一下编辑这套书的一些想法。

研究各种不同学术领域,都要去追溯相关的学术史研究,学术史就存在于人们为发展、创新学科而作的知识的回顾和反思中。我个人理解的学术史,还不是证明通向今天的知识权力之路:不宣示正统、不标榜权威,而是探寻过去曾经出现却未能被承袭的那些学术实践和学术思想,它们就好比知识之路上的一个个潜在指向另外通路的标识。我们发掘某一个时代文化的知识地层,发现找到这些潜在的标识,重新思考它们的可能性和意义。正是这种清冷的工作,今天的知识之路因此才得以拓宽,今天的学术因此才更具有反思理性的价值。学术史,在我看来也可以说就是重新梳理知识谱系的工作。本书是关于民国学术史的,作者是文科各学科的专业研究者,他们将各自对本学科的学术史反思书写出来,对于今天有特别的意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读到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柯的《癫狂与文明》(《古典时代疯狂史》的中文缩简译本),<sup>①</sup>石破天惊般的震撼,一读再读,为福柯的历史思想所深深吸引。之后读了更多福柯的东西,特别受益于《知识考古学》。<sup>②</sup>福柯用考古学的地层学思想来考察知识与思想史,指出历史

---

① 福柯:《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 福柯:《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是断裂的而不是延续的。这引导我走上研究历史之路,并且着迷于思想与知识史研究。福柯晚年以“知识—权力—身体”三角关系作谱系学分析,用知识谱系学代替自己早年的知识考古学。用这种谱系学分析方法,福柯写出了《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福柯的谱系学考察产生知识的真理体制和求真意志是如何在某种权力形式和权力关系中诞生的。相比早年的知识考古学,福柯放弃了对“深层意义”和“本质”的追问,而关注“表层”,寻找时间的细节、微小转换和细致轮廓的外现,用福柯自己的话:“谱系学是灰色的,注意细节的。……谱系学要求耐心和对话细节的知识与广泛的原材料的积累。”福柯以此谱系学反对黑格尔似的绝对理念展开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并非存在终极目的,历史并非普遍理性的进步史。福柯反对根据现在写过去的历史,反对决定论,他是要书写“问题化的历史”。福柯对历史呈现在表面的花纹作细节的梳理和谱系解读,在历史面前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打破决定论迷信的科学研究方法。我将这三本书称为《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是向福柯致敬,我们同样试图书写“问题化的历史”,发掘新材料,用细节来展开思考。

感受真实外物是知识的来源。很多年前去卡纳维拉尔角宇航中心,展柜里有一块美国宇航员从月亮上捡回来的石头,展柜上开一个可以伸入一只手的圆孔,这是专门用来给人们触摸感受的。美国和欧洲的城市,有专门出售化石的商店,旅游景点上小摊贩出售各种化石和化石制品更是随处可见。小孩子购求收藏古巨鲨、剑齿虎的牙齿化石,恐龙的爪和骨化石,从小爱好亲近这些东西,对探索古生物学、矿石学的知识,有着无比的帮助。说到考古学,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在弗吉尼亚自己的田地里发掘,第一次把一座土墩墓横切出了一条探沟或剖面,从而开创了现代考古学。可惜在知识来源的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留给我们的很多是全然直觉的神秘通见,拒斥所有的闻见之知,甚至不依靠任何符号,而可以直接深入事物内部,与事物融合为一。老子“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孟子接受并发挥了老子的这个思想,认为心是思的器官,只有心才能思;耳、目如果去接受外物,只能受到外物的诱引而妨碍心思。“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

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sup>①</sup>孟子还强调“志”对“气”的指导,使气运行身体内受到“义”的养育而至大至刚,成为充塞宇宙的浩然之气,然后就可以“内圣外王”了。中国传统教育强调在本文化里如何去做好“人”,绝少鼓励,甚至是禁绝对外物知识的探索。

东汉“学问开始带有校勘学、考古学的性质。它已不单纯是思想的产物,而变成了附有历史内容的学问”<sup>②</sup>。魏晋个人觉醒,一些最优秀的学者直面自然追求真知。虽然陆玑、郭璞还是以为经作注的传统形式在作品中植入自己探索的新知,但是他们的发现真是了不起。张华第一次记述了石油及其特性,郭璞详细描述了大熊猫、白鳍豚。<sup>③</sup>可惜这样的学问和做学问的方法,传统社会中少有传承。魏晋时期陆玑、张华、郭璞等人的知识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面向自然、面向真实外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最早指出西方早期博物学中存在一次与数理科学革命内在关联的认识型转换,但魏晋博物学并未在中国引发可以导致科学革命的认知。

明清一些模仿《博物志》的著作,比如明董斯张的《广博物志》,是神话、传奇、故事、器物等等分类抄录的类似类书的“杂烩”,其知识的兴趣在于广记异闻,而完全不在于探索、发现和不断地批评求真。我猜测董斯张的这部容纳宇宙万物知识的庞大著作,有可能就是博尔赫斯所说的某种中国百科全书,并且就此成为福柯《词与物》的“前言”开始讨论的对象。当然,也可能是《太平御览》。

福柯说他写《词与物》,是受博尔赫斯的启发,博尔赫斯曾引述过“某种中国百科全书”中出现的对动物的如下分类:(a)属于皇帝的动物;(b)散发香气的动物;(c)驯服的动物;(d)乳猪;(e)美人鱼;(f)臆想的动物;(g)自由的狗;(h)包括在此分类中的动物;(i)像疯子般激动的动物;(j)不可胜数的动物;(k)用很细的驼毛笔画的动物;(l)其他动物;(m)刚

① 《孟子·告子上》。

②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71页。

③ 朱渊清:《魏晋博物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刚弄碎了罐子的动物;(n) 远看像苍蝇的动物。<sup>①</sup> 福柯说:“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界限,即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去思考。”<sup>②</sup>“那么,不可能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哪种不可能性呢?这些奇异标题中的每一个我们都可以给予确切的意义和可表明内容;某些标题确实包含稀奇古怪的生物:传说中的动物或鳗螈,但是,恰恰是因为把那些东西置入它们各自的位置之内,这部中国百科全书才能定位它的传染性;它谨小慎微地把十分真实的动物(那些发疯的动物,或刚打破水罐的动物)与那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动物区分开来了。”<sup>③</sup>福柯意识到:“侵越任何想象和任何可能思想的,仅仅是把所有这些其他范畴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英文字母系列(a、b、c、d)。”<sup>④</sup>福柯清楚地认识到古代中国有一个包容宇宙万物的,并且被固定分类所预先规范的知识认知体系。这就是绝大多数唐宋类书所代表的,以天、地、人、事、物、鬼、神无限展开的知识分类体系(《太平御览》有更复杂的55部分类体系)。用预先固定的分类体系来表示宇宙秩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举代数学为例。中国以算法为中心的筹算制度,未能形成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筹算数学发展到十三世纪已经到达极限,再向前发展必须向符号代数转化。元初,朱世杰(1303)用天、地、人、物来表示四个未知数,其系数分别放在“太”的下方、左方、右方和上方。上、下、左、右四个方位,只能放四个未知数。如果有五个未知数,就无法安排,推广到n个更不可能。突破筹算限制向符号代数转化没有完成,中国数学就此出现三个世纪的中断。<sup>⑤</sup> 其实,用天、地、人、物表示未知数,已经有了引入符号的特征,可惜这套符号带“场”出现,表示的是文化的宇宙观秩序。

---

①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三联书店,2016年,第1页。

②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三联书店,2016年,第1页。

③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三联书店,2016年,第1页。

④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三联书店,2016年,第2页。

⑤ 梁宗巨:《从数学史看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

中国古代知识的分类体系起源于“小学”《尔雅》，这是孔子及其学生为解释《诗》、《书》、《礼》、《易》、《春秋》语词含义而开始编辑的词典。中国古代的知识是以经部为核心的。“经”是规训的知识。所谓六艺，说明了“经”的来源。春秋末，孔子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他整理的书籍课徒。《隋书·经籍志》说人何以为人的六教。春秋后期，略早于孔子，齐国的五官技和楚国的九门学也都是规训的知识。<sup>①</sup> 古籍四部分类中，经部之外的其他部都是经部的扩充和修饰。

中国古代传统知识是规训型知识。规训型知识是老辈人形塑、教化、规范小辈人，教育他们“其何以为人”、如何做人的知识。这种以人的规范教育为目的的知识系统，忽视自然界、忽视实物、忽视人自身的各种技术发明和创造。我以探索型知识与规训型知识对应。探索型知识是直接面对自然界、积极认知真实外物、积极创造与发明各种技术，通过批评质疑而不断求真的开放的知识认知系统。中国历史上，在万千科举状元进士之外，还是有张华、郭璞、沈括、宋应星、徐霞客这些传统文化的异类。不管如何，人类知识在社会中保存传承，却只能创造发明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的大脑中。

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因为西方现代科学的传入，发生了最根本的变化。民国初年，旧的知识体系终于瓦解，全新的现代知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大量西方的科学知识，以及分析思维的方式，是由罗振玉、王国维、丁文江、胡适、傅斯年他们接受、引介进入中国，他们成为民国新学术的引导者。罗振玉和傅斯年之间的争论，其实是关于学术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傅斯年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后，非常运气的是殷墟发掘震惊世界，科学的考古学在国家主义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罗振玉贡献了殷墟在安阳小屯的准确地理位置。罗振玉从二十世纪初发现甲骨始就以个人之力全力搜求研究，对甲骨卜辞的年代、卜法也有开创性研究，他的指导及其收藏品还帮助王国维作出了商代世系的重要研究。但是罗振玉的“器物学”（包括

---

<sup>①</sup> 朱渊清：《五官技和九门学》，《知识的考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64页。

艺术史)在中国却很难发展起来。这背后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层原因。在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多考虑器物学和艺术史的发展了。

器物学和艺术史的发展需要物产权的法律保障。意大利美第齐家族的文物和艺术品鉴赏和收藏活动,与银行业乃至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中国的墨子和孟子奠定了中国的乌托邦政治思想:老有所养、幼有所依、死丧有埋葬。乌托邦政治思想中没有“产权”概念,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历史,从来就没有对产权的初始界定和重新安排以选择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的契约的法律制度。孟子和梁惠王谈与民偕乐,说到用民众之力造灵台、灵沼,与民共赏鸿雁麋鹿,前提还是洿池山林都属于王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以及土地埋藏和生长物的所有权从来不在民众手里。孟子要求“明君”“制民之产”,所以他的“有恒产”之说<sup>①</sup>我总感觉不可靠。当然,我赞同孟子有自由经济思想。<sup>②</sup>

罗王之学,是要从文献走向实物真实。王正华关于罗振玉的收藏的研究引人深思,完全渊源于个人兴趣的个人知识,在现代考古学的初起之时发挥着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最近读到类似的一个关于吴大澂收藏的研究。<sup>③</sup>从吴大澂到罗王是中国传统古器物学的延续,但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转折。就我自己来看,罗振玉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还远不止于王正华所写。我本人曾写了一篇7万字的长文《王国维的困局》,因为体例和篇幅等原因,此次没有收入,有点遗憾。徐坚关于李家楼、洛阳金村出土文物及其搜集整理的研究,是他寻找的“潜流”。汪涛、陈星灿、方辉的几篇关于中国考古学初起时的文章,利用非常难得的档案材料告诉我们一些不可忽略的关键细节,也提醒我们更全面更审慎地评估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作用和影响。相比之下,我关于劳费尔的《中国古玉》只是一个读

---

① 《孟子·梁惠王上》。

② 侯家驹:《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63—158页。

③ 白谦慎:《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书笔记,出现在书中仅仅为弥补劳费尔这位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在中国少人问津的遗憾,到目前为止,他两百多种作品中仅有《中国伊朗编》和《中国篮子》<sup>①</sup>被翻译成中文。

我本人写了朱希祖史学的文章。朱希祖是现代学术史上几乎完全被遗忘的重要学者,他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学科课程体系的最早设计者,对国史编纂、档案整理、地方史志、文物调查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历史研究,从先秦一直到太平天国乃至民国初年,范围广涉历史研究的几乎所有分支学科。朱希祖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汲冢书考》迄今为止还是中国史学史最重要的一项研究成果。翟志成现在的胡适与钱穆的论文,是遵从翟先生最近的意见。7年前,我向翟先生求要的另一篇论文不能收入,我感到遗憾。那篇论文是关于胡适和冯友兰两本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显然就哲学史言,冯书超越了胡著。胡适是最宽容大度的人,然而在对待冯这个超越自己工作的成绩时,他的表现并不能坦然。徐雁平的文章与这套书的整体风格似略有不同,但中国文学史是中国人文学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雁平兄利用族谱作的家族史研究很富特色。

赖德霖贡献了两篇关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论文。德霖兄是清华大学学建筑的工学博士,又是芝加哥大学艺术史博士,由建筑设计师来写的建筑史是很可珍视的。李军关于沈从文的文章,时间跨度上已经超过了民国。李文对沈从文的思想的解读富有激情和启发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可以不说,不能胡说”的沈从文放弃文学,从事器物学研究。中国现代古器物学的建立,与一个仅仅接受过小学文化教育的文学家紧紧相连,这是我执意收入军兄文章的原因。我大学的启蒙老师程应镠先生可以说是沈从文晚年唯一的朋友。程先生上课经常说到沈从文,说他闭着眼睛摸一下瓷碗的底就知道是什么年代的,我当时听得一愣一愣。沈从文先生后半生的大部分日子不好过,但他以个人之力,几乎重

---

<sup>①</sup> 贝特霍尔德·劳佛尔著,叶胜男、郑晨译:《中国篮子》,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

器物学与艺术史

建了现代中国的古器物学学科。

《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分“历史学”、“考古学”、“器物学与艺术史”三个部分。当然这些仅仅是民国人文学术的一部分。

2019年11月21日草

# 罗振玉的收藏与出版：“器物”、 “器物学”在民国初年的成立<sup>\*</sup>

王正华

## 引 言

罗振玉(1866—1940)不仅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收藏家、出版人、艺术品商,也是个集教育与农业改革者、前清遗老及伪满洲国官员等身份于一身的人物。研究者近年来对其多采多姿的一生,以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扮演的多样且充满矛盾的角色,有了更丰富的认识。<sup>①</sup> 晚清时期,他因倡议新学有功,而为张之洞等清末大员及清政府重用;当时代的巨轮一转,1911年政治鼎革之际,他仿佛在一夜之间从晚清时声誉卓著的改革提倡者,一变而

---

\* 本研究获得“台湾科学委员会”年度计划的资助,谨申谢意,并感谢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于笔者赴日研究期间慷慨的协助。本文初稿曾发表于2008年8月由Nixi Cura及杨佳玲教授所组织的罗振玉研讨会,非常感谢两位组织者的邀约。白谦慎及Robert J. Culp两位教授曾于不同阶段对本文提出宝贵的建议,受益良多。另外,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意见,让本文更为完整。本文原为英文,承蒙牛津大学刘宇珍博士翻译成中文,在此一并申谢。

① 见Shana Julia Brown,“Pastimes: Scholars, Art Dealer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1870 - 1928”(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联经出版社,2009年;张惠仪:《遗老书法与新出土书法材料——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发展的契机》,《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9期,2005年9月,第163—208页。关于罗振玉在苏州的教育改革,见Peter Carroll, *Between Heaven and Modernity: Restructuring Suzhou, 1895 - 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19 - 124. 此外,Nixi Cura在2007年3月24日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年会上,组织了以清遗老文化活动为主题的专场(panel),除笔者外,参加者尚有白谦慎、Shana Brown、Joshua Fogel,而罗振玉即是此专场中最常提及的人物。

为效忠前朝的保守势力,与民国初年主流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对立。他虽崇尚中国古学,在保存传统的种种作为(practices)上,却又处处师法日本,且在日本所扶植的伪满政权里为官。他一生中时为大大小小的经济问题所迫,挣扎在供养其家或实践自身对学术与古物保存的使命之间。经济压力及学术使命虽驱使他广搜文物,并出版大量的书籍,使之成为中国史上最多产的作者与编者之一,却也让他蒙上传统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市侩之名。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罗振玉所涉及难以截然划分黑白的道德与政治议题,已值得研究者关注。本文则欲将焦点放在罗振玉于民国建国后的十年间(约1911—1920),以一介避居海外的前清遗老,对学术研究及古物保存等议题所进行的种种文化作为。借由检视罗振玉的收藏及其出版事业,本文将探讨中国近现代史上与古物保存息息相关的重要课题——“古物”的重新定义与重新分类。新定义与新分类不仅赋予“古物”一个崭新的思考架构与历史意义,“古物”亦反过来赋予保存论述“实质”(materialistic)的内涵,对于何谓“中国”形成新的认识。此一对“中国”的新认识是建立在一件件具体的物品上,而非只是典籍中斑斑记载的文献内容。罗振玉可说在这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他将各色各样的历史物品都收纳在古物保存的论述里,而新的分类、新的思考架构亦由此应运而生。时至今日,我们对这些古物的看法,仍脱离不了罗振玉所提出的思考架构。

罗振玉对于古物保存的种种见解虽萌芽于清末,其实践却要等到民国建国后的十年之间。在此十年间,别人视他为清朝遗老,他也自认为是清朝遗老,遗老身份毫不模糊。和其他的清遗民一样,他的政治与文化理念总似紧密相连。当旧时代的价值观随着清政权的崩解而渐被扬弃,一股存亡继绝的迫切感,驱使罗振玉积极地实践其古物保存的理念,他遂在1910年代清楚表述了这些文化主张。罗振玉忠于清室、甘为遗民的政治选择,实与其保存古物的种种文化作为密切相关,尤其可自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化活动中窥知。在清廷倾覆前,罗振玉展现更宏观的企图心,等到民国肇建、自己成了人人眼中保守的清遗民后,他才专心于古物保存及相关的学术研究。

本文之作,横跨当前中国研究的两个新兴领域——古物保存与清遗民

研究。近年来,好古之风(antiquarianism)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已吸引来自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与艺术史等背景的学者从事跨领域的研究。中国悠长的史学传统与尚古之风,更令此议题充满了前景。然而,除了中国自身所具有的绵长传统之外,对中国好古之风的研究实仍处于蒙昧不明的状态,尚未结成可连篇累牍讨论的果实。其中固然不乏开创性的研究,却仍缺少大批学术成果的厚实积累。<sup>①</sup> 对于古物及好古之风在近现代的转化所知更少,例如二十世纪初不同政府、民间团体与个人关于古物保存的论述与实际作为。本文意欲填补此一空白,以罗振玉为切入点,检视其古物保存的理念如何在他成为清遗民后的十年间,落实于物质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 一、重新评价清遗民及罗振玉

学界对罗振玉的兴趣,代表着进一步理解这批忠于清室之菁英世代的更大企图。<sup>②</sup> 此企图促成对清遗民的重新评价,特别是清遗民在民国纷扰政局中的立场,以及他们在传统菁英文化转型至现代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姑不论个别学者用以探索的角度是否有所异同,总体的研究成果可说更丰富了民初政治、社会及文化所呈现的历史图像。

对清遗民的负面报道可追溯至辛亥革命成功之始,于民国初年更是屡

---

① 关于中国好古之风的开创性研究,见 Jessica Rawson, “The Many Meanings of the Past in China,” in Dieter Kuhn and Helga Stahl, eds., *Die Gegenwart des Altertums: Formen und Funktionen des Altertumsbezugs in den Hochkulturen der Alten Welt*, Ed. Forum, 2001, pp.397 – 422; Craig Clunas, “Images of High Antiquity: The Prehistory of Art in Ming Dynasty China,” in *Die Gegenwart des Altertums*, pp.481 – 492. 陈芳妹:《宋古器物学的兴起与宋仿古铜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0期,2001年,第37—160页;《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宋代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第23卷第1期,2005年,第267—332页。此外,可见近期出版的相关新书。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The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② 关于近期清遗民的研究成果,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第4—14页。

见不鲜。被讥为“遗老”的这批人,是民初公众媒体批判挾伐的一大门类。他们既然仍以皇清子民自居,其公众形象自不可避免地与失势的王朝相连。在政治上,他们被当成贪得无厌、镇日权谋、处心积虑筹划复辟的野心分子;在文化与社会上,他们又因所效忠的君主政体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如传统的家庭伦理等),而显得过时迂腐,甚至有害于现代化中国的未来。<sup>①</sup>

再者,当今主流的史观亦多侧重于促成中国现代化的元素,将新文化运动(约1916—1920年代初)描绘为主导中国现代历史轨迹,甚至是唯一的思想、政治、社会与文化潮流。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中来自海外的新成分,以及该运动本身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剧变,不仅早已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也决定了历史叙述的基本调性。<sup>②</sup> 即使在讨论所谓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里,亦见不到清遗民的踪迹。<sup>③</sup> 学者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时,多半选择讨论那些积极参与各种思想及社会文化论辩的人物。即便“文化保守主义”此一标签可包含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且各有其拥护的政治、社会及文化观点,清遗民仍因其与当代主流的论辩看似无关,而隐身于历史舞台之后。<sup>④</sup>

若以革命史观看来,1911年的辛亥革命赋予民国正当性与正统的地位,

---

① 虽然只有少数清遗民积极参与复辟运动,然报章所载的清遗民形象仍是如此,既片面又偏颇。例见《晨钟报》1916年9月26日,10月1日,11月11日、17日;1917年3月20日、23日,4月24日、27日,5月2日,6月20日、25日,8月13日、17日,9月5日、20日、26日,10月24日、25日,11月1日;1918年1月11日、24日,2月4日、10日、18日,3月4日、9日,4月15日,5月8日、31日,6月7日。近期研究亦显示清遗民在二十世纪初期多给人负面的观感,见张惠仪《遗老书法与新出土书法材料——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发展的契机》,第163—208页;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第五章。

② 近年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在看待新文化运动对历史撰述的影响时,已有了不同的见解。见 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 - 191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 - 52; Rana Mitter, *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③ 例如,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④ 王国维(1877—1927)可说是唯一的例外。他被视为学术泰斗,而其投湖自尽的悲剧性结局,更使之成为二十世纪初年世风剧变下,仍能坚守道德与文化节操的知识分子之典范。见 Joey Bonner,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第四章。

清遗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遂显得边缘化,评价亦多属负面。在历史上,辛亥革命都是正面且积极的历史过程——推翻帝制政权,结束封建时代。部分清遗民其后在伪满洲国为官,更被视为背叛民国的理想,乃是国族的叛徒,清遗民的历史形象于此更堕入无可挽救的地步。

相较于史册中受到高度评价的南宋(1127—1279)及明(1368—1644)遗民,历史对清遗民的贬抑更显得特殊。“忠君”的道德标准原是维持王朝政权的重要支柱,但这在清遗民身上显然并不适用。<sup>①</sup> 史家对于明、清遗民迥然不同的历史评价,似乎也不全然只因为清朝是满族人而非汉族人所建立的政权。更重要的是,有一股对清朝及其一切相关价值的敌意,于清末民初之际弥漫在中国,成为集体心理。这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之内,然若以研究明遗民的热忱,对清遗民的社会文化及思想背景作进一步的了解,必能对民初这一段重要的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主流的历史研究不管对新文化运动有如何多面向、多角度的理解,清遗民的历史都无法进入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议题之中。明遗民多采多姿的艺术与思想表现,已被公认建立了中国十七世纪下半叶文艺的黄金时代,而清遗民的社会文化角色及其历史意义,仍有待探索。

然而,本文之所以重新定位清遗民,并不在于他们是历史上常被忽略的一群人,而是因为他们的确在中国近代传统文化生产的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此处所谓的“传统文化生产”(traditional cultural production),指涉文人阶层的文化,特别是足以宣示文人文化特色的艺术及古物收藏作为。大多数的清遗民都属于末代仕清的文士,原本即为政治、社会与文化上的菁英,他们自小受传统的儒学教养与科考教育,长而投入仕途,除了为官之外,尚饱读诗书,学养深厚。例如,清遗民中有多人在传统诗学与中国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沈曾植(1850—1922)、陈三立(1852—

---

<sup>①</sup> 笔者了解南宋、明朝与清朝遗民的道德与政治诉求并非只是“忠君”如此简单,但此处主要论点是凸显清遗民在史册中被忽略的现象,无须处理不同朝代遗民对于新旧政权的对应态度与思想脉络。